

●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与中国现代文学



●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首届东南亚华文
文学研讨会专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庄钟庆 等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37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5615-0383-0/I·24

定价：3.30元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编辑例言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它们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因之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著作，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交流，推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本丛书贯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凡是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论据充分，在学术上富有创见，不论是综合论述或是专题探讨，本丛书均欢迎。外籍或华侨学者亦不例外。

三、本丛书由庄钟庆、庄明萱任主编。

目 录

王 瑶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东南亚…………… (1)
庄钟庆	遐思与遥望——简说中国现代文学与东 南亚华文新文学之交…………… (16)
云 鹤	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24)
楚复生	菲华文学概观与建议…………… (39)
陈 恩	山川相异。日月同天——略谈菲华报业 及文艺的社会背景…………… (45)
欧阳国泰	《菲华散文选》的语言特色…………… (50)
苏淑端	独向椰林觅句来——菲华诗人苏甦及其 作品简介…………… (59)
王润华	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阶段与 方向…………… (65)
蔡师仁	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的探寻——方修 《新马文学史论集》评介…………… (78)
陈贤茂	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 (89)
林 也	解放的新世界——新马现代文学的 发展…………… (105)
彭杜生	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125)
吕飞亚	马华早期散文的特色…………… (131)
孙逸忠	郁达夫战时对星马华文文学的贡献…………… (146)
黄奕谋	《咖啡的诱惑》与《日出》的血缘

	谈及其独特性	(161)
巴 尔	泰华文学的起步与曲折的历程	(176)
岭南人	李少儒 谈中国文学移植泰国的 演进	(184)
徐 学	泰华写作人笔下的泰华世界——谈 《风雨耀华力》	(191)
王惠明	泰国华文作家巴尔的创作	(198)
陈育伦	东南亚华语口传文学初探	(214)
蔡师仁	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 学的关系——中国首届东南亚华 文文学研讨会综述	(224)
编后记		(231)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东南亚

王 瑶

(一)

在本世纪初，列宁对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描述：“民主革命席卷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骚动也正在增长”；列宁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爪哇以及其他将近4000万人口的荷属殖民地”。列宁根据“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起来”这一事实，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亚洲的觉醒》）。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论断：世界殖民主义的瓦解，被压迫民族国家（我们以后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兴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必然要在20世纪历史图景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可以说，在20世纪，不仅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西方无产阶级有着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国家之间（例如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土耳其、波斯、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利益，有着共同的敌人（外国

殖民主义者与国内封建势力)和共同的奋斗目标,因而必然会结为一个互相声援、互相影响的整体。而文学,作为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不可能不反映这样的历史特点的。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文学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各民族国家及其文学互相交流影响、渗透,并在保持各自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形成某些共同特点的过程。它是独立的——即将任何一个“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学的)强加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又是开放的——那种封闭的,闭关自守地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就是20世纪被压迫民族和新兴国家的历史,同时也必然是20世纪各新兴国家民族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把握了这个基本的历史特点就不难理解,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一方面,自然要通过这一特殊的文学实体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渗透,以及作为本世纪被压迫民族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某些共同特点;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充分注意“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作为东南亚地区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然显示出来的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学所独有的特色。为了充分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地区文学在本世纪的互相交流,影响与渗透,我们不妨把研究的视野扩大一些,考察一下反映东南亚地区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这些中国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革命运动与文学运动发生过联系),以便引起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深入思考。

早在本世纪初,当中国人民刚刚觉醒,中国现代文学还在酝酿时期,就已经受到了东南亚地区文学的影响。鲁迅在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指出：“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öfi Saa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义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坟·杂忆》）。这里所说的“厘沙路”（J. Rizal），通译黎萨，既是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又是菲律宾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绝命诗（1896年作）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鲁迅所说的事实，不仅有力地揭示了东方现代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国际文学背景，而且点明了其共同的特征——“复仇和反抗”的文学精神；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地区现代文学的关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大量的文学史事实表明：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时开始，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生活、命运，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即已引起了现代作家的关注，并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领域；以后，在中国革命与文学发展的每一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与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许多中国革命者或作家流亡到东南亚地区，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和与文化建设活动，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以东南亚地区人民，特别是华人的生活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以自己独特的绚丽色彩，例如异域情调、热带风光、生活习俗和活动场景等，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东南亚地区各国自身的文学，特别是以汉语为表达工具的华文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作品显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文学的互相渗透、影响的特征，也显示了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所具有的表现不

同生活内容的深厚潜力，因此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研究价值。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种边缘性、交叉性的文学现象，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想，今后是一定会引起大家注意的。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本来没有发言权，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查阅了一下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家词典》（现代部分），仅从所收的作家传记里，就发现在东南亚有重要活动和创作成果的作家，为数就不少。这里我不必一一叙述他们的成就，但我想这是可以说明我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的密切联系的。

（二）

现在，我想就我所接触到的几部（篇）中国现代作品，作一点分析；就算是解剖“麻雀”吧。

首先要说的是许地山的作品。许地山本人生于台湾，只到过缅甸与印度，并未去过马来亚、新加坡一带。但他早期作品（主要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中），不仅以中国、缅甸、印度，而且以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为背景，例如他的代表作《缀网劳蛛》中女主人公尚洁在被丈夫无理放逐后，就是借居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土华”，并在与当地的土人——采珠者的交往中获得心灵的慰藉的；另一篇小说《商人妇》的女主人公渡海寻夫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被已成为当地富翁的丈夫所转卖；新加坡的生活成为她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在描写这些“异国”时，不论写地理环境，自然风物，还是写文化氛围，社会风俗，都不着重写“异”，而着意突出其“同”，甚至在小说中一再出现人物国籍的“混淆”，如《商人妇》中，“我”初次见到

那位闽南妇时，竟把她当作了“印度妇人”，而《黄昏后》里的男主人公关怀的“外貌象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日本人”。这就是说，在许地山的笔下，无论是中国、缅甸、印度，还是马来亚、新加坡，都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同一时期许地山对“近代艺术”的理解，他强调“东亚底艺术”与“西欧底艺术”的对立与渗透（原文是这样的：“近代艺术正处在意见冲突底时代，因为东亚底艺术理想输入西欧，西欧底艺术方法输入东亚，西方完全不同的特点，彼此都看出来”——《中国美术家的责任》，《晨报副刊》1927.1.8），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许地山的文化观中，“东亚”地区是有着共同的（或接近的）文化背景与传统的。他的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得失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大都以东亚地区为背景，实际上也是从这种文化观出发的。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地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在宣扬、肯定一种人生哲学：“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限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志，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去追求”（《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在代表作《缀网劳蛛》里，作者把这种人生哲学形象化为“采珠人精神”：小说主人公尚洁从马来半岛上当地人的采珠劳动中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启示：“人生就同入海采珠一样，整天冒险入海里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没有”，但采珠者却不会因此而放弃“每天迷蒙蒙地搜求”，“每天总得入海一遭，因为她的本分就是如此”。许地山小说中每一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主人公无不具有这样的精神与性格：无论是《商人妇》中被丈夫转卖的妇人，《缀网劳蛛》里屡遭不公平待遇的尚洁，还是《黄昏后》中年丧妻的关怀，

都以极其平静的态度对待面临的苦难，既不违抗“命运”，又不屈从“命运”，在“顺应自然”中表现出内在的顽强与韧性。在这种人生哲学与性格里，显然融汇着印度文化中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学说的影响；在许地山看来，中、印文化的交融，儒学与佛教思想的汇合，正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特征。饶有兴味的是，许地山笔下的主人公不仅主要继承与发展了这种东亚文化的传统精神，而且受到了西欧文化的影响。《缀网劳蛛》与《黄昏后》的主人公都同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商人妇》中那位在顺从命运中又顽强地坚持着“独立生活的主意”的妇人甚至自称为“女鲁滨逊”。在许地山小说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亚文化与西欧文化的汇合，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汇合，既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时期）的时代特点，也表现了作家的一种文化理想和见解。

如果说“五四”时期许地山作品中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生活的描写，主要是采取“文化”的角度，那么，“五四”以后的以东南亚地区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逐渐转向“政治”的角度，这是同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发展趋向相一致的。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及的是老舍写于1929年至1930年间的《小坡的生日》。在有关老舍作品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提及这部作品，实际上《小坡的生日》的创作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是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的。这一点老舍自己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的小说了”；正是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及“激进”的政治思想使老舍“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东方人无暇管文艺，他们要炸弹与狂呼”。如果说老舍早期创

作具有单纯追求趣味性的倾向，那么，从《小坡的生日》开始，老舍就比较注意对作品思想性与教育意义的追求，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老舍说：《小坡的生日》是“幻想与写实”的“夹杂”，作者“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这就点明了《小坡的生日》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作者是通过对儿童“天真”的言谈动作来表现自己“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即作家对东南亚地区生活的独特观察与理解，对东方民族命运的独特的思考。小说第二章的题目是“种族问题”，所写的却是小坡和她的妹妹的游戏：小坡有一个“宝贝”：“一条四尺来长，五寸见宽的破边，多孔，褪色，抽抽疤疤的红绸子”；“这件宝贝的用处可多了：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胸后还搭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中一围，当作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再用妹妹“几个最宝贵的破针”把“宝贝”缝成“小红园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小坡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小坡就变成了“阿拉伯的买卖人了”。这“变来变去”诚然是一种游戏，却表现了一个天真的儿童所特有的“种族观”：“他以为这些人都是是一家子的，不过是有的爱黄颜色便长成一张黄脸，有的喜欢黑色便来一张黑脸玩一玩”。这种族的“平等观”、“一致观”也是作者的，在老舍看来，所有被压迫的东方民族——无论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尽管肤色不同，生活习俗不同，“都是一家子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命运与追求。这样，小说里几个小孩——小坡、小坡妹妹小仙，两个马来小姑娘，三个印度小孩，两个福建小孩，一个广东胖小孩，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特别是在小坡的梦中他

们共同与“老虎”的搏斗，都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寄寓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理想：“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小说在小孩们的游戏中也“随手儿讽刺”了“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冲突与不合作，马来与印度人间的愚昧与散漫”（《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是表达了老舍对东南亚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问题的独特观察与认识的：他站在现代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既强调各民族自身弱点的克服与改造，又突出了被压迫民族团结、联合的思想。这种对东方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强调，同许地山作品中对东亚文化共同性的强调，存在着内在的一致，又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稍早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洪灵菲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流亡》；小说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描写了主人公、革命者沈之菲流亡在新加坡与暹罗（泰国）的生活。《流亡》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具有很强的主观抒情性；因此，小说中描写的新加坡与暹罗的自然风物都只是一个背景，起着衬托小说主人公心理、情绪的作用。在作者笔下（实际是小说主人公的眼睛里），新加坡与暹罗的本地人都是“态度极倨傲，极自得”的样子，全然缺乏同情心，这固然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更是小说主人公主观情愫——革命低潮时期所感受到的孤独感与寂寞感的——折射。今天的读者最感兴趣的，也许是小说主人公，作为一个中国的革命者，对于新加坡当地人民及其文化的观察、感受与评价——

“最令他觉到有浓厚的趣味的是那些新加坡土人。他们一个个都是黑脸膛，黑发毛红嘴唇，雪白的牙齿……行路时飘飘然，翔翔然，眼望星月，耳听号风，大有仙意。在灯光凄暗，夜色幽沉的十字街头，……披发跣足的土人幽幽地来

往，令他感动。……

“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又觉得无聊。他想起过班羔羊被吞噬着，被压迫着的苦楚，又不禁在替他们可怜了！”

“他们过的差不多是一种原人生活，倦了便在柔草的草原上睡，热了便在茂密的树荫下纳凉，渴了便饮着河水，饿了便有各种土产供他们食饱。他们乐天安命，绝少苦恼，本来真是值得羡慕的。但，狠心的帝国主义者，用强力占据这片乐土，用海陆军的力量，极力镇压着他们背叛的心里。把他们的草原，建筑洋楼；把他们的树荫，开办工厂；把他们的生产品收买；把他们的一切生死的权限操纵。

“他们的善良的灵魂怎抵挡得帝国主义的大炮飞舰！他们的和平的乐园怎抵挡得虎狼纵横占据！唉！可怜的新加坡土人，他们的好梦未醒，而昔日神仙似的生活，现在已变成镣枷满身的奴隶人！”

这里有对新加坡土人所保留的原始文化“乐天安命”的自由生活的欣赏和羡慕；这自然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感所产生的；同时更充满了一种对破坏了当地人民自由和平生活的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憎恨，对于被压迫民族不幸命运的同情，以及由于他们的“羔羊”般的软弱、不觉悟而引起的焦虑和怜悯。人们不难发现，《流亡》里的这位中国革命者对于新加坡土人文化的评价与感情，同中国革命者及现代作家对待本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感情，有着惊人的类似或相通之处；原因很简单，“虎狼”般“占据”着新加坡“和平的乐园”的帝国主义者，也同时“占据”着中国“和平的乐园”！这样，在洪灵菲的《流亡》里，“中国与新加坡等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命运”的主题就得到了鲜明的发挥。

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里曾经不无遗憾地谈

到，由于自己不可能深入到新加坡“内地”作更深入的观察，因此只能通过对儿童生活的描写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洪灵菲的《流亡》也由于作者在新加坡与泰国逗留时间太短，对于当地生活的描写更带有浮光掠影的性质。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的，是许杰的有关创作。由于许杰在吉隆坡担任当地华侨报纸《益群日报》的主笔，直接参加了当地的文化工作，这样，他对于当地人民及华侨的生活及马来本土文化就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他的作品也就把同类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在许杰的集子《椰子与榴梿》里读到了对南洋土著吉龄人（印度民族的一个支派）的拜神仪式更为详尽。真切的描写，同时读到了对当地华侨“观音佛祖出游”及新式“提灯会”的生动描绘，作者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得出了“东方的民族，或者是殖民地的民族，恐怕都是吃了鸦片烟的——无论这鸦片是宗教的，还是什么”的结论，并且明确地把落后民族“宗教的放纵”归之为“帝国主义者的……怀柔手段”（《椰子与榴梿·吉龄鬼出游》）。在许杰的笔下，还出现了反抗殖民主义者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在一篇题为《两个青年》的小说里，他描写了两个华侨青年在马路上张贴传单，被殖民当局当场抓去的故事，作者一面热情赞颂了革命青年的“勇敢”，同时又委婉地批评了他们不注意斗争策略的幼稚，态度既鲜明又冷静，这与作者已经有了国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显然是有关的。许杰的创作具有比较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这同他接受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有直接联系。他不仅用自己的创作来实践了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在吉隆坡以《益群日报》的文艺副刊《枯岛》为阵地，积极倡导“新兴文艺”运动，明确宣布要以《枯岛》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的大本营”。许杰在这一时期所写的

大量文艺短论里，系统地介绍与宣传了“文艺是社会的反映，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普罗文学”对于“被压迫的贫苦人民”具有“超于同情之上的同情，他是除了同情以外，还指示他方向，鼓励他勇气，觉醒他自我的地位，责任，及其意识，敦促他找出路，走上必然的光明的大道”等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主张，并结合当地的实际，鼓励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马来地区自己的革命文学。许杰的上述理论与创作活动，在马来一带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据许杰的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介绍，近年来，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会长杨松年先生曾撰文对许杰主编的《枯岛》副刊的历史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编者“把中国新文学的革命文学的理论带来新马”，“《枯岛》在许杰的策划与编辑下，不但发掘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而且也成为早期积极响应建设南洋文艺色彩与推动新兴文学的副刊。它是战前（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文坛的重镇，也是新马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文艺园地”。事实上，起着这种将中国新文学与马来新文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用的，远不只许杰一人。由几代作家艰苦卓越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学上的密切联系，是20世纪东方被压迫民族、第三世界国家大团结，大联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应当十分珍视的光荣传统。

（三）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从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大批爱国文艺工作者流亡到东南亚地区（当时叫“南洋”），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而以英国、荷兰为主的殖民当局，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在思想、文化统治上有所